

延安文艺的时代价值

李姣姣

延安鲁艺文化中心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要]延安文艺是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革命战争年代生成和发展的文艺形态，是整个延安革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历史复杂性和特殊性不言而喻。如果说延安文艺是我国文艺史上的“奇观”“壮举”和“伟业”，而它革命性力量的来源就在于对时代精神的正确把握和极力弘扬，延安文艺是时代精神浇灌的艺术之花。

[关键词]延安文艺；人民性；时代价值

【DOI】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1.1308

一、把握时代的脉搏

文艺作品要抓住时代的脉搏，才能发挥出文艺特有的政治功能。古今中外概莫如是。延安文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知识分子不仅完成了对自己的改造，也通过各种文艺活动动员人民投入到反侵略战争中，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安娜·路易斯曾向丁玲询问中国文学的最近趋向，丁玲说“我们演出戏剧、公开演讲、在农村墙上画漫画，还必须教会农民唱救亡歌曲。每个村庄的农民至少会唱两首歌。”

1939年3月，冼星海创作了他在延安第一部成功的作品《生产运动大合唱》。自此，“二月里来好风光，家家户户种田忙，指望着今年的收成好，多打些五谷充军粮”的歌声很快传遍了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这些文艺作品，让陕北农民认识了抗战、了解了抗战，进而参加抗战、支持抗战，农民逐渐学会了“革命”“支前”“抗日”。

艺术的根须只有深深植于现实的土壤之中，根植于人民大众的生活之中，才能牢牢把握人民的需求和时代的精神脉搏，才能获得时代和民族的共鸣。

延安文艺工作者不再是象牙塔中的精神贵族，他们深入部队前线、田间地头，把识字、征兵、征粮、募捐、运输、选举、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反摩擦斗争等各种社会动员任务，化用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乡村巡回演出。用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反映军民抗战，揭露日军暴行，激发边区民众的抗日热情，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受到到边区军民的普遍欢迎。《刘二起家》《二流子变英雄》《钟万财起家》等秧歌剧，大都取材于真人真事，特别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在1943至1944短短一年间，陕甘宁边区共改造二流子6400余人，占原划定二流子总数的三分之二，劳动力迅速增加。延安时期的“二流子”改造运动树立了劳动光荣的现代价值观，唤醒了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的思想觉悟和主体意识，使他们获得了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这些作品主题鲜明，格调明朗激越，洋溢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发挥了振奋民族精神的重大作用。正如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对延安戏剧活动特点的敏锐概括：观众与演员共享着舞台上的生活，对观众来说，舞台上的流血牺牲、悲惨壮烈并不是“艺术”，而是他们正在经历的生活，是以简陋朴实的形式表达他们自己的戏剧般的经历。

延安文艺鲜明的时代性还表现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及个人与时代关系的准确定位上。延安文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革命战争是当时现实生活的主要内容，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获得民族解放、过上民主自由的新生活是普遍的社会心理和精神追求，是主

流社会意识形态。因此，反映战争、鼓舞人民、一切为了“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是延安

文艺的目的和宗旨。当时的一切文艺组织、团体、刊物以及各种文艺活动的开展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与宗旨进行，这是延安文艺生存与发展的时代语境，也是时代对文艺的迫切要求。这种时代特征是我们考

察延安文艺精神实质时必须牢牢把握的基点，偏离或者忽视这个基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遮蔽延安文艺的璀璨光辉。

强调文艺要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要呼应时代需求，要以弘扬时代精神，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任，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和商业化的社会转型中，文艺创作的私人化、商业化、娱乐化盛行，在此时代语境中，继承和发扬延安文艺鲜明的时代性，使文艺成为人类建立美好精神家园的有效手段和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建设性力量，正当其时且任重道远。

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延安文艺具有深广的人民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鲜明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知识分子曾努力追求的“工农分子知识化”变为“知识分子工农化”。文艺工作者下乡参加工作、访问劳动英雄，参加变工组织，与他们同吃同住、谈心聊天。然后将这些农民的故事创作成文艺作品。

生产、教育、抗战是延安文艺创作和表演的三大主题。用群众的语言，讲群众的生活，寓教于乐，在潜移默化中，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激发了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提高了农民

的觉悟。作为培养抗战文艺工作者的学府，鲁艺的办学口号是：到前线去，到敌人后方去，到农村去。那时，鲁艺学员要“学习三个月、前方实习三个月、返校再读三个月”。

1943年的春节期间，鲁艺秧歌队在宝塔山下，延水河边，杨家岭上演出了《赶毛驴》《推小车》等节目，轰动了整个延安。有的群众跟着秧歌队走了三十几里，连看几场，舍不得离去。随后，延安各文艺团体也行动起来，普遍组织了秧歌队，在延安的街头广场，在乡村地头，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受到了群众热烈的欢迎。《拥军花鼓》在东乡罗家坪演出时，当王大化、李波唱到“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时，老乡们马上就接唱道：“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新秧歌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是受苦人自己的秧歌，秧歌演出的都是和他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农民常常不自觉地对号入座，倍感亲切。

三、延安文艺走出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

近代以来，传统的中国文艺及其体制逐渐瓦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以西方文艺为参照发展起了“中国新文艺”。但“新文艺”因为是“横向的移植”，缺乏本土资源与基础，一直未能解决如何突破知识分子的圈子而为更广大的民众接受的问题。“延安文艺”是在现实与民众的结合中走向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如果我们将延安时期开创的“人民文艺”与其他时期、其他派别的文艺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人民文艺”既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古典文艺，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任何一种文艺思潮与创作，它是最贴近中国经验而又最适应中国民众的审美趣味的，完全是一种新的创造。它是中国现代精英智慧与民间智慧的有机融合体。因此，当代中国文艺要有大的发展，也必须是在继承古典文艺、外国文艺的基础上，在与现实、与民众的结合中走一条“中国化”的道路，在这方面，“延安文艺”的成功经验无疑值得汲取。

四、超越了精英的文化

“面向工农兵”，不仅仅指文艺作品要大众化、通俗化，还包括了文艺工作者要站稳人民的立场，向大众学习，改造自己，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

在延安时期，戏剧的舞台已经不再是“看”与“被看”的关系，

也不是文艺工作者的专属。那时候的延安，出现了工农兵当主角、作家诗人当参谋和工农兵与知识分子合作等新的创作方式，农民的主体地位开始受到关注，涌现了许多劳动诗人、作家和歌手。

陕甘宁边区自1938年成立“民众娱乐改进会”后，1945年1月，边区文教大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民间艺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民间艺人数以百计地遍布城乡。

1945年4月，边区说书组正式成立，说书改造受到关注，出现了以木匠诗人汪庭有，练子嘴英雄拓老汉，劳动英雄、不识字快板诗人孙万福、王老九等为代表的民间艺术家。

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既改造大众，又改造了知识分子自身。这种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结合，最终超越了精英文化。

五、从娱乐到教育

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贴近生活，在反映群众的生活的同时，也承担着教化的作用，重塑了农村社会。

在文艺作品中，积极生产、公而忘私、勤劳持家、孝敬老人、爱护儿童是宣传和弘扬的主题。二流子懒汉、为富不仁者、吸食鸦片者、不孝敬父母者、虐待儿童和妇女者等都是讽刺、抨击的对象。戏曲里所提倡的那些被认为是进步的行为，逐渐成为普通民众日常行为的道德准则。

《新状元杨朝臣》讲述了安塞杨朝臣的勤劳生产和改造二流子的真实故事。陆喜娃是剧中二流子的原型，他在杨朝臣的感化下重新做人。当《新状元杨朝臣》在小樵湾演出时，陆喜娃看到剧中的他出场时，羞得低下了头，泪流满面地跑了。后来，他说：“咱今年决心学好，定要把光景闹美！”

将医疗教育、卫生等方面知识编进节目中，更是获得了民众的赞誉。延安的难民工厂编演了秧歌剧《娃娃病了怎么办》演出后，许多婆姨都哭了。那些婆姨说，你们的秧歌比

以前的好，因为你们的秧歌句句话都是有用的，旧秧歌中看不中用。

那时，新秧歌等文艺活动对于延安的群众已经不仅是娱乐活动了，还是他们自我教育的手段。延安群众说：“你们的秧歌有故事，

一是讲生产，年青人都爱看，旧秧歌没意思！”延安时期，秧歌从没落的“老太婆”艺术转化为了“青年”艺术。

六、延安文艺与延安精神

在中国革命的艰苦岁月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标志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诞生的“延安文艺”，以其鲜明的现代民族性品格、崭新的艺术风貌，成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

有人认为延安时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次历史性的飞腾。而延安精神则是实现这次历史性飞腾的伟大动力。当前，延安精神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上的意义，愈来愈为人们所瞩目。透过一篇篇具有史诗性的作品，让人们感到了正是这样一大批杰出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圣地播种了延安精神的种子，使延安精神成为凝聚全国人民艰苦抗战、革命到底的最为宝贵的力量。延安文艺这种具有了新时代文化精神内涵的文艺，不仅区别于传统文化中具有爱国情操的哀国悯民或个人的匡济艰危，也有别于五四以来新文学中对不幸民生的悲悯与忧思，它呈现的是一种真正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化精神品格。

结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对文艺的高度重视，加之他们自身对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点，结合中国的时代背景和现实环境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文艺发展的政策。

文化（文艺）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它的当代借鉴和启示意义。延安文艺为现代中国革命和文化建设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延安文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实践过程，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家园中难以割舍的优秀传统，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重新认识延安文艺精神，对于真正认识“中国历史”、思考“中国问题”，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也正因此，延安文艺研究应该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日益凸现，并且成为一个全新的亟待高度关注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 [1] 蓝海：《中国抗战文艺史》[M]. 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 [2] 《“轻骑队”及其他》[N]，《解放日报》1942年4月6日。
- [3] 《我们的自我批评》[N]，《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 [4] 《当前的剧运方向和戏剧界的团结》[N]，《解放日报》1942年5月19日。
- [5] 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M]. 湖南：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

李姣姣，女，陕西延安人，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文博馆员。